



癸巳暮冬，晨霜凝寒，范曾先生课众弟子于北京大学燕南园。我有幸赴会。范曾先生卓然正座，如霞染澄塘，虹贯中天。众人摄受其中，剧谈高咏，诵吟轮番。置身其间，辞藻飞扬，妙语连珠，令人应之不暇，恍然世外。

末了，大家作四言笺纱格诗钟，范曾先生点名由我出题。“诗钟”好比行酒令，是古人的一种限时吟诗的文字游戏。“笺纱格”是“诗钟”的一种格式，要求出题人为上下联分别出两个词，参与者分别用上下联把这两个词的意思嵌进去，让人一目了然，却又不能出现这两个词面。局促之下，我即兴出“石头、庄周”二词。

现在看来，“石头”为物，“庄周”是人，如此命题，颇有刁钻。范曾先生对众弟子所作逐一批阅点评后，亮出了自己的“笺纱”联：补天藏梦，得意忘言。赢得满堂喝彩。女媧以石补天，庄周得意忘言。“补天藏梦，得意忘言”令人叫绝，范曾先生卓然古今之风采，又见一斑。

曾见张伯驹先生一诗钟联：上颜春意朝酣酒，到耳秋声夜读书。跋曰“温平词兄雅政，与友为诗钟，限笺纱格，色、树二字。”上联引唐人李正封《牡丹诗》“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巧妙嵌入“色”的意思；下联引北宋欧阳修的《秋声赋》，欧阳修风夜读书，问书童户外秋声何来，书童外出巡查一番，掩门答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下联“到耳秋声夜读书”对“树”亦巧夺天工。

曹植和曹丕互对“诗钟”长大。曹丕称帝，想杀害曹植以除后患。他们的母亲劝曹丕念及兄弟之情，放过曹植。曹丕遂命曹植在殿前七步之内，以笺纱格作“兄弟”之诗，否则杀无赦。这就是著名的“七步成诗”之典故。《七步成诗》流传至今的一个绝句版本为：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通篇不见“兄弟”二字，却写绝了当时他俩的兄弟之情。这一回，曹丕被打动了，他的那把冷血长剑，还是被曹植无形的才诗真情挡了回去。

中午时分，我在燕南园作别范曾先生与诸弟子，离开了由先生主事的中国画法研究院。再次踱步北大校园，感觉步点与心情比来时轻快了许多。那时的北大，雾霾沉沉，看不到臆想中轻轻的云彩，却看见百年前那些经世济民的大风流，依稀就在左右。那时的人们，诗文浩瀚，个顶个儿怀抱家国天下的大丈夫。

不由记起儿时村庄夜晚的天象。阴天夜晚的时候，天越黑沉，星星就越是寥落。可恰恰那寥落的一颗两颗，闪亮异常。它们会划破长夜，点燃万丈光芒。

不知不觉，已走到北大校门口，投身外面的车水马龙。心情和步点愈加轻快。我下意识再次揣摩了背包里的物品，暗暗琢磨，来去的心情差别如此，难道只是因为范曾先生赠了我《达摩》炭笔速写画作！

千年吉州窑瓷马俑

◆ 王华新

法，从上述七件马俑可以看出首先以捏塑方法做出马或骑马人，然后用雕刻手法刻出马和人物的头部以求生动准确。而制瓷大师舒翁和其女舒娇就是著名的民间陶瓷家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舒翁善于烧制玩具，舒娇则长于烧制炉瓮，并擅长构图上釉，产品以白釉、绿釉、黑釉、彩绘为主。他们烧制的各种玩具和绘有佛、仙的瓷瓶，造型别致，色彩明快。

吉州窑瓷塑品种繁多，主要分人像及动物两大类。属于人像的有官吏、平民、仕女、武士、仙翁、佛像等；属于动物的有马、牛、狗、虎、猴、鹅、鸽、鱼、龟等。多采用手塑和

模制两种手法，或两法兼用。这七件瓷塑均采用手塑法制作，先捏出人体或动物躯干再植以头面、四肢、冠带衣饰等，再用小工具刻画出颜面五官、衣纹走向。骑马人分别制出马和人物，再将人物安插到马背上。这些瓷马俑全凭手做，所以形制无一相同，虽简洁而富于变化：稚气十足的小马（一）、跃跃欲奔的中马（三）、若无其事的大马（二）、抚摸马头的骑手（四）、举目四望的男（五）女（六）骑马人和高耸鼻梁的骑马胡人（七）。这七尊瓷塑虽只有5x8厘米左右大小，但制作前作者都经过精心策划，信手捏来，加上娴熟的手法使小小玩具也

变得生动传神，在简练中寓精巧，于自然中见匠心。特别是酱褐釉骑马胡人（七）的特殊造型所揭示的胡人身份与唐三彩中骑骆驼胡人遥相呼应，这是古代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将吉州窑与世界连接的又一物证。只有西域、中亚或欧洲人到过吉州永和，古时的东昌县城，若非舒翁和舒娇亲眼目睹过他们，怎能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瓷俑？

据有关专家考证吉州窑瓷器出口主要有四条路：沿赣江下南昌、九江经长江溯运河北上入渤海到登州接近辽境；或到沿海明州、杭州销往日本、高丽；或溯赣江而上经瑞金、长汀、龙岩至泉州运南洋、印度、非洲转欧洲；或由赣州、大余、梅关、南雄、韶关经北江到广州运往南洋、波斯、印度和非洲等地。海上丝绸之路把吉州窑瓷器销往全世界几十个国家，也使吉州窑美名传遍天下。



钱仁康先生题“渔歌唱晚”

◆ 卢金德

中。每星期二课强化训练，得了三等奖，使我练了耳。“文革”十年，邻里许成章先生是二胡演奏家，精乐理。我们就像读专业的一样，常听他演奏和听他讲音乐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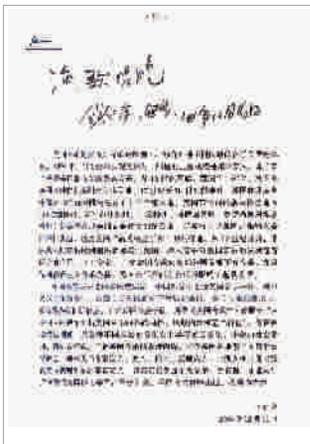
“文革”后，我在书店买到一本艺术理论书，这本书收集了中国最有成就的艺术理论家的文章，而音乐界的就是钱仁康先生。真是有缘，那时我供职的文联研究室在巨鹿路，楼下就是“上海歌声”编辑部，院里又有音乐家协会，我结识了好些音乐家，那时朱践耳大师有交响乐作品问世，我去武宁路他家采访，文章刊“南方周末”。后来文联迁延安西路，而钱仁康先生的女儿就在“上

海歌声”任编辑，一个楼面。

钱老住进华东医院，我常去看他。“采风”杂志是文联刊物，一日与编辑说起音乐界的钱老值得采访，马信芳去的，他说钱老很健谈。我去看钱老，钱老很高兴。我向钱老讨教音乐的学问时，钱老送我他的文集。后来我去看钱老还带去五十年代钱老在音乐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钱老说，“你还保存这些刊物，不容易”。不过有一本刊有当时批判他的音乐思想的音乐刊物我没带上，怕勾起往事伤他心。

病床旁有本笔记本，钱老的护工说，钱老看书遇上好句子就记在上面。我看过几次，记的都是很

精辟的语句。这与我遇上的晚年的钱春绮先生一样。我为了了解钱老，和进一步自学音乐理论，我的出版社的朋友送上好几本出版社出版的音乐理论书。正巧一本王岷著的2005出版的《美国音乐史》是钱老写的序。我带上去看他，他看了好一阵，“什么时候写的，记不得了”。他很想看这本书，但互相推让了一番后说，“你喜欢你留着，你把我的序复印给我”，并声音很大地嘱咐我：“不要忘了。”那时钱老98岁了，我也想日后在音乐评论上有所长进，便请钱老题了“渔歌唱晚”，我说我很喜欢这句话。钱老说他也喜欢这句话。



我少年时，学校要参加区的合唱比赛，到各班挑选音色好的，我意外地与班里的另一位同学被选

作为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的“重头戏”之一，“市民收藏大展”吸引了众多民众的眼光，反响热烈。

有幸在静安区几百位收藏爱好者中脱颖而出，被选中作为静安区的代表，经静安区收藏协会的推荐，我参加了此次上海市民收藏家的评选，最终荣列“百名上海市民收藏家”之榜，并有幸与其他的收藏家一道在“三山会馆”举行为期一个月的收藏大展（右图）。

回首三十年来的铜镜收藏经历，心中感慨良深。

刚进入铜镜收藏这个领域时，也曾上过当，交了不少“学费”。

还记得早先太原路上有个卖古玩的地摊，那时玩铜镜的人不多，市面上赝品并不多，我在那个地摊上收了一些镜子，都是真品，因此心里对其便放低了警惕。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仿镜开始出来了，仿的水平也很高，面上看起来都是很好的品相，以我当时的“菜鸟”眼光，着实不大看得出真假。于是，很快就上当了。

那是一枚唐镜，镜背雕有鸟兽纹，纹饰非常漂亮；拿在手中，手感也很厚重，猛一看是枚精品镜。买回去清洗过后，我就把它当成宝，时常拿在手中把玩，连睡觉时都要放在枕边，醒了就看两眼，当真是爱不释手。

玩了一段时间后，最初的惊喜

回顾我的铜镜收藏

◆ 张东

之情慢慢淡了下来，看它的眼光也多了些冷静，渐渐觉得它的分量与之前收的同规格的唐镜相比有些偏重，包浆也比之偏新，缺乏一些长久积淀的厚重感，心里忍不住就有了一些怀疑。后来一次和同行交流时，因为心里始终不大舒服，便将镜子拿出来给大家看看，结果几个同行一看，都觉得包浆不对，一致认定此镜应是赝品。

这个深刻的教训让我一直耿耿于怀，此后便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学习铜镜收藏的相关知识。除了不断总结自己以往的收藏经验，积极与老收藏家们交流，经常去旁听一些比较权威的关于铜镜的文化讲座，阅读铜镜方面的专业书籍，积累理论知识外；还时常去拍卖行观看那些准备拍出的真品，努力寻找机会“上手”，增加自己的实践经验。就这样慢慢地日积月累，我渐渐悟出了一些鉴别铜镜真伪的办法，也真正建立起了自己在铜镜收藏方面的自信。

一次和几位朋友去江西淘宝，来到一家古玩店，老板拿出了几枚镜子，只除了其中一枚外，其余几枚镜子大家都没什么异议。感兴趣的朋友把那几枚镜子收入囊中后，大

家便围绕那一枚镜子争论起来。

那是一枚很“素”的镜子，铜质看起来有些黯淡，不似唐镜那么光亮照人，镜缘也不是很规整的圆，只有围绕着素钮有一小圈颇为诡谲的放射状有些似花瓣的纹饰（见左图）。朋友们都认为此镜是赝品，因为该纹饰实在少见，几乎不曾见过与其相似者；且其镜背上还有被后人用尖利物刻出的一列文字（如今也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就算是真品，只怕也是收藏价值不大。

而我却不认同诸位朋友们的看法。看着该镜不是很圆的镜缘和有些黯淡的铜质，不由得就想起了先前在书里看到的商周时期的铜镜。早期先民的铸镜技术没有后世成熟，镜缘还比较难以像后世那般浑圆，而含锡量的缺少也使得镜子的铜质难以如后世那般光亮。至于引起最多争论的纹饰则让我想起了商周时期的芒纹镜。远古先民有太阳崇拜的文化特征，这一点也反映在他们所铸造的铜镜上：先是简单

